

信息时代中国主流文化整合与文化 多样化发展的矛盾

——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一种探讨

代金平^{a,b}, 郝 焯^a

(重庆邮电大学 a. 法学院; b. 学报编辑部, 重庆 400065)

摘要:社会文化整合是西方社会学功能论和冲突论两大研究范式长期研究的重要问题,有效地实现社会文化整合,也是社会文化持续、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当代信息网络的开放性,使信息文化形态呈现出多样化文化共同发展的态势。这在极大地丰富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同时,又加大了社会主流文化整合的难度。因此,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在促进多样化的文化发展中保障和突出社会主流文化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

关键词:信息时代;社会文化整合;主流文化;多样化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5-0133-06

一、社会文化系统的整合机制和整合功能

如何有效地实现社会文化的整合,以保障和促进社会文化的持续、和谐发展,是西方社会学功能论和冲突论两大研究范式长期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

在社会学发展的早期,奥古斯特·孔德即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认为语言、宗教和劳动分工对实现社会文化整合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埃米尔·杜尔克姆则进一步从社会团结的角度探讨了社会整合的机制。他认为,社会团结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结合的关系。机械团结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特质的基础上,它使社会文化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以对差别性、异质性的强制压抑为基础。有机团结建立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且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每个人的个性就越鲜明,同时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就越深,社会整体的统一性也就越强。杜尔克姆认为,社会团结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分工;作为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信仰、情感的总和的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法律是保障社会团结的力量。相反,高度分工条件下个人与群体的活动配合不够、与高度分工相联系的正在增长的异质性和个性、阶级制度与外在的不平等,则是威胁社会团结的主要因素。杜尔克姆把处于缺少规范与丧失整合的社会状态称为“失范”。社会失范的主要成因,一是个人欲望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急剧增长而社会不能满足所有个人的欲望;二是社会骤变使个人欲望失去了社会约束。防止和解决社会失范的途径主要包括: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即“道德化”;控制经济活动,改善劳动分工协作关系,即“组织化”;创造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团体,以避免国家集权与个人分散、无力的状况,使社会更富于有机性。

收稿日期:2008-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文化建设的导向研究”(07BKS044)

作者简介:代金平(1964-),男,山东烟台人,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常务副主编,法学院教授,硕

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功能论的主要代表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人存在于社会之中,人的行为除了受动机支配外,还受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支配,因此,社会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文化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行为系统等四个亚系统。其中,文化系统是模式化和秩序化的符号系统,是行动者的目标、是人格体系的内化、是社会体系内的制度化模式。因此,文化是结合社会各种元素的主要力量。文化调节社会体系中行动者彼此间的互动,并整合人格与社会体系。在社会体系中,文化是标准与价值观的体现;而在人格体系中,文化则被行动者内化^{[1]74-75}。

帕森斯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满足了对环境的适应、目标的获得、社会的整合、模式的维护等四个基本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他尤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的满足,认为“整合有两种意义:(1)指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2)指体系内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2]97}。一个社会要达到整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有足够的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依照角色期待而行动。(2)社会行动必须避免形成差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社会系统要实现自身的整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实现人格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整合。包括通过社会化机制将文化模式(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等)内化为人格系统,以及通过社会控制机制减少成员的紧张和越轨。二是文化系统与社会行为“互动”的影响。文化模式产生作用的方式主要包括:(1)通过向所有行动者提供共同的文化资源,使互动成为可能。(2)文化对互动影响通过文化模式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而得以发挥。这些思想可以向行动者提供共同的立场^{[3]80-81}。帕森斯强调,实现社会整合需要社会成员接受和遵守社会的共享价值观。他认为这些共享价值观将社会“粘”在了一起,如果过多的人拒绝接受这些价值观,社会稳定将会崩溃。

尼克拉斯·卢曼用“一般系统”方法来研究社会行为或沟通系统。他认为,社会系统是由人们的行动通过广义的编码(如语词、货币、权力、真理、情爱等)沟通,“有意义地相互联系”而产生的。为适应复杂的环境,特定系统必须发展出降低复杂性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时间、物质(空间)、符号三个基本维度。社会系统包括“面对面”的简单互动系统、以科层制组织为典型的正式组织系统和社会系统三类。随着社会日益扩大和复杂,三种系统之间的分化将不断加剧,在功能范围、进出规则、沟通媒介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产生一系列问题。如缓慢、耗时的互动系统经常妨碍组织的高效率运行,组织系统之间的利益经常相互冲突,甚至用严重损害更大的社会系统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尽管三种系统分化给实现整合带来困难,而且造成导致冲突的条件,但在卢曼看来,这种分化也创造了整合的补偿力量,通过社会整合过程可以消除这些破坏性倾向:(1)不同层次的系统互相在对方内部“筑巢”(nesting)。如互动系统内的行动经常纳入组织系统,而组织系统的行动则在社会系统内

进行。更广泛、容量更大的系统能为子系统的选择行动提供时间、物质及社会前提,给每个子系统的周围环境强加一种秩序或结构,从而对整合起促进作用。(2)人们在横跨不同功能领域中不同组织的活动时所出现的差异,也会促进整合的实现。(3)组织的进出规则降低了成员在组织外发生冲突的相关性。(4)一旦组织的分化成为社会中的既成机制,那么特定的社会控制组织如法律、警察、法院就能很容易地建立起来,以便缓和和解决冲突。

与前人不同,卢曼认为,在复杂系统中,维持秩序的不是共同价值、信仰及规范的一致性,相反,在这些问题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卢曼还强调,个体在道德和情感方面对社会组织的依附不是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在复杂社会的大部分领域,都不可能回归到高度凝聚的共同体。与其把异化、自我中心主义、失范等事实视为病态,不如把复杂系统中许多遭遇者的非人格化和中性化看作是正常的,并且在分析这些现象时可以少作价值判断。在复杂系统中,人们缺乏感情依附,这使人们有更多的自由、选择以及更大的灵活性,同时也使人们得以摆脱传统等因素的束缚。

卢曼认为,一切社会系统都是建立在行动者之间沟通的基础上的。由此他相当注重所谓“通信理论”,认为沟通根据表征行动者的行为路线的符号发生。符号组成的编码在挑选降低环境复杂性的可选择的手段时起指导作用,媒介降低复杂性是因为它们限制了系统中的行动范围。在使用媒介时,系统能够借助于“观点”或“主题”而使自身及其与环境关系概念化,提供处理环境的时间、物质和符号三个纬度的指南,从而降低复杂性^{[3]134-135}。

与功能论相反,西方社会学中冲突论研究范式则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尽管冲突论者强调的重点在于社会不断变化的性质,但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社会冲突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L·A·科塞强调“冲突”建设性的、有益的功能。他认为,“冲突”的正面功能主要包括:(1)冲突对社会与群体具有内部整合功能。冲突有助于建立和维护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边界线。外部冲突可以促进群体内部的团结。虚拟的“冲突”对群体也具有“聚合”的功能。(2)冲突对社会与群体具有稳定的功能。它增加了社会结构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如果没有冲突社会就会僵化和停滞。(3)冲突创造了新的联合与联盟,对新群体与社会的形成具有促进功能。(4)冲突创造新的规范、价值观念和制度,对新规范和新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5)冲突较量展示了冲突各方的相对力量,从而导致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这样,冲突作为一个社会中重要的平衡机制,有助于社会的维持和巩固^{[2]324-329}。

科塞还提出了排解敌对情绪的“社会安全阀”的思想。他指出:“我们使用‘安全阀制度’这个术语用以表示将敌对情绪引向替代对象的制度(或为这种转移提供替代手段的制度),而不是指这种制度可以使冲突表现出来。”^[4]科塞认为,敌对情绪的发泄具有安

全阀的功能。社会系统往往需要为人们提供排泄敌对情绪的制度,这些社会安全阀制度可以使猛烈的敌对情绪不断排泄出去,而不至于破坏整个社会结构。

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现实的西方社会并不像功能论者所构想的“均衡”的、“内在稳定”的社会体系,而是冲突充分展开的社会。冲突的展开必然促进社会结构的有机性不断增强,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冲突已经制度化,成为有规则的、形式化的、可预测的和可控制的。社会具有两面性,即一致性和冲突性,一致和冲突是彼此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为了遗弃功能论只看到社会共同价值一致、均衡的乌托邦,就要求用强调强制、冲突和变迁的冲突模型来取代片面的功能模型^{[1]82-83}。

功能论对社会文化系统的整合机制和整合功能的研究,从其基本立场看,它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把阶级冲突视为“我们现代工业型社会的特有病态”^{[2]323},根本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作辩护,“它不仅为维持西方社会秩序寻找途径,也为社会改良寻找理论依据”。但是,通过对社会整合机制、社会系统的整合功能的研究,制订相应的社会文化调控对策,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化和谐、持续发展,则是不同的社会都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功能分析被当代西方大多数社会学者公认为是解释社会研究材料最有成效和最有前途的方法,是探索社会稳定的重要理论工具^{[2]83}。

西方社会学冲突理论看到了社会及其文化中差异、冲突存在的现实,强调冲突是社会结构的固有成分,变迁和稳定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状态,并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冲突和变迁对社会文化整合的潜在的正功能。但是,从其理论的整体倾向看,冲突论者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往往抛弃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强调工业社会的冲突,目的并非鼓励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而是为统治阶级寻找调节冲突的途径和方法,以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社会结构,其基本立场仍然是改良主义的。

因此,我们应当坚持科学的辩证否定的态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上述西方社会学中有关社会文化整合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应用性方法加以批判性地借鉴。这对于我们研究信息时代如何在促进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同时,突显先进的主流文化,达成它对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具有一定的参照。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是:(1)在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和人的个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要有效地实现社会文化整合,一个需要正确处理的基本问题是:既要树立共同的社会理想、目标,将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内化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向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文化资源,又要促进多样化文化和人的个性的和谐发展。(2)考察社会文化整合问题,首先需要研究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人格系统、行为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同时又需要研究社会、文化系统如何有效地对抗外来

的压力,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而寻求实现社会文化整合的条件、方式和途径。(3)考察社会文化整合问题,需要研究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整个社会系统在社会文化整合中的作用;研究文化模式、沟通媒介在时间、空间和符号等维度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4)要有效地实现社会文化整合,既要承认多种价值观念、信仰和规范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又应当通过各种社会文化机制对越轨行为和文化失范现象加以控制、防止和解决。(5)要有效地实现社会文化整合,应当重视现实中社会文化冲突和社会文化转型、变迁的影响,积极发掘社会文化冲突对实现社会文化整合的正面功能,正确处理和调节各种内部矛盾,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构建新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各种制度和社会文化规范,促进社会文化的持续发展。

二、信息网络的应用和扩散对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整合的冲击

就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文化整合(integration)是指社会体系中文化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行为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达到协调一致,积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社会稳定有序地发展的过程。而在社会主流文化整合的层面上,则是指特定的社会主流文化体系,通过社会化机制和社会文化控制机制,协调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认同、接受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信仰、制度和行为规范、语言及其他符号等模式,形成自身人格,支配自身行动的过程。有效地实现社会文化整合,是社会文化持续、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提供了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工具,它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交往与沟通方式,形成人类“数字化”、“网络化”的新生存方式,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在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丰富了人们不同类型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实现社会文化整合奠定了新的经济、物质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另一方面,信息网络又以其显著的开放性质和信息传播方式,降低了社会主流文化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导致了社会主流文化整合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矛盾。

当代,中国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良文化传统,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信息网络的应用,为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对外文化交流,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间,开辟了新的传播途径,创造了先进的传媒工具。但是,由于网络媒介传播方式本身的特性,则加剧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整合的困难。从社会体系与文化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影响、社会文化整合的方式、外部环境的压力等方面考察,网络媒介对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整合又有其负面

影响。

第一,信息网络的开放性质,强化了中国社会文化中各种文化子系统并存的态势,放大了各种亚文化子系统的影响,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支配地位。毛泽东在论及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时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从现实社会生活看,中国正处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阶段。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为实现社会主流文化的整合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但同时,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变迁,又给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整合带来了消极影响。表现在:(1)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必然引起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并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强烈的冲击,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生活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2)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如赢利原则、交换原则、竞争原则等,在形成强大的激励机制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弱点和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关系中,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3)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加剧,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4)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5)中国社会文化中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重新泛起。这些造成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与各种亚文化、反文化的碰撞和激烈冲突,从而形成一个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非标准化”时代。多元价值观念的存在,一方面扩展了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主流价值和共同理想的弱化,许多主流价值被遮蔽和消解,绝对价值被相对主义所颠覆,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被杂乱无章的多元价值混淆,社会在很多方面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准则。正是以这种相对主义和多元化的价值观为基础,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并在人们的心目中日渐淡化。

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众神狂欢”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关乎各种各样“主义”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并且,开放的网络以其无中心化的逻辑结构,信息自由平等交流的交互方式,超越时空限制的信息传播优势,通常有利于放大现实社会中被控制、压抑的因素,使一些越轨亚文化尤其是反文化子系统在网上获得了传播的空间,并得以在全社会迅速扩散,反过来又对现实社会生活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声音。

第二,信息网络的开放性质,对传统社会文化引导及调控的手段和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主导作用。对于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介,政府的相关机构可以通过主办单位进行行之有效的舆论导向,并依照法律的规定加以管理。但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网络参与的平等性赋予了每一个上网者公开发布信息的“话语权”,给社会主流文化的舆论导向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网络的去中心化和超越时空的结构,让我们难于有效地对信息的传播加以控制;网络行为的虚拟性、匿名性,通常成为诱导信息行为失范的重要因素;而信息文化制度规范的匮乏,又往往使文化调控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因此,如何适应信息网络的开放性质,探寻运用网络媒介进行文化调控的方式,将是发挥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主导作用所面临的新问题。

第三,信息网络的开放性质,为外来文化的入侵提供了便捷的途径,造成了对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冲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其主要的方式就是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图谋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全球性、快捷性,给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提供了方便的途径。西方国家不仅通过网络广泛传播西方的文化、生活方式,而且一些敌对势力还通过网络直接散布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和言论。思想文化领域这种长期、复杂的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从外部环境方面给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整合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三、把握时代精神,积极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整合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辩证统一

针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态势,江泽民提出了建设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6]置身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信息化、网络化的环境中,我们应努力探索信息文化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积极推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实现社会主流文化的整合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辩证统一。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实现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整合奠定现实的物质经济基础和精神条件。按照“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制定和实践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文化发展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这是实现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整合的现实基础和基本的前提条件。要抓住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积极推进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解决好注重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协调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整合奠定物质经济基础。同时,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到重要位置,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现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入人心,构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继承优良民族文化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体系;要重视制度文化建设,构建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信息文化特征、发展规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社会道德、文化规范,并通过各种社会群体、组织施行文化调控,为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整合提供完善的制度规范,形成网下网上社会文化调控有机结合的社会控制机制。

第二,针对信息文化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行正确的舆论、文化引导和先进信息文化建设,保障社会主流文化的支配地位和强化其主导作用。信息文化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是一种“虚拟实在”的文化空间。这就决定了在“数字化生存”中,人们的信息行为和传播方式具有不同于现实社会的各种特性和规律。因此,坚持正确舆论、文化引导,推动先进信息文化建设,较之施行具有强制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社会主流文化的整合,将更富有成效。其途径和方法主要包括:(1)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中国已有60%左右的国家部委和各级政府在互联网上设立了自己的站点。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英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使中国掌握网上文化竞争的主动权,抢占网上国际文化战略高地,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政府的文化、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高网络监控、管理水平,监测、过滤、截获、跟踪流入、流出的信息,防止不良信息的传播,确保信息安全和网络健康、正常与规范化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息文化体系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2)加强“红色网站”建设,构筑网上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网上先进文化教育活动。江泽民同志早在2000年6月就指出:“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7]中国在加快信息化进程的同时,也在网络空间留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白,即使一些网站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但也犹如浩瀚海洋中的一叶孤舟。现有的大多数网站仍较少考虑人们对思想修养、道德规范、情操陶冶等方面的需求。这种状况应当引起党和政府文化宣传部门,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主动进入网络,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及时调整

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在互联网上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红色网站”,大力开发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资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尤其是中国革命优秀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宣传社会主义价值准则,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信息网络空间,为广大网民释疑解惑,同网上错误思想作斗争,使信息网络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加强“红色网站”建设,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信息资料比较贫乏,更新速度慢,形式单一、枯燥、呆板等问题。这些问题,致使信息网络中绝大多数的主流文化信息没有新鲜感、时代感,缺乏对信息用户的吸引力、凝聚力。所以,在“红色网站”建设过程中,应当根据网民的多种文化需要,开辟健康向上的学习型、娱乐型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文化活动,以达到寓教于学、寓教于乐的效果。(3)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形成先进的信息文化建设的合力,建构信息行为和传播的自律机制。先进文化建设是群众的事业,信息网络是大众化的文化生活空间。先进的信息文化的建设需要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各种社会组织和群众共同参与建设工作。要调动信息网络运营商、信息服务商、各上网企业、电视广播机构等参与先进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加强企业信息文化建设,将传播先进文化与其业务工作相结合,自觉规范自身的信息行为,加强对网络信息发布、传播的监测和管理;要通过各相关的民间协会等社团组织、社会自治组织,制订相关的网络行为自律规范,约束其成员的信息行为,营造良好的信息网络文化环境;要鼓励各类文化、教育学专家与计算机、网络、外语等专家密切合作、协同一致,共同致力于发展先进信息文化;要通过宣传、教育和引导,提高广大网民网络伦理水平和网络法制意识,自觉约束自身的信息行为,并为建设先进的信息文化奉献自身的才华。

第三,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创造网络环境中有利于多种文化共同繁荣的条件。在信息网络中,各种文化信息庞杂多样、层次参差不齐。就高层次的较为系统的文化信息而言,对于那些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观点和言论,应予以坚决的反击并采取措施加以取缔。对于一些理论上的学术争论,则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并通过争论和斗争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而实现理论和文化的创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在历史上积淀了深厚的优秀民族文化成果,政府应当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鼓励他们积极实现优秀民族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和弘扬多样性的优秀民族文化,并融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于多样性的、进步的、健康的、有益的亚文化形态之中,使信息文化呈现出社会主流文化与多样性的民族亚文化、地域亚文化、职业亚文化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发展,千帆竞发的生动局面。

第四,坚持科学的心理行为引导,有效地调控越

轨亚文化,保障多样化文化的健康发展。就信息网络中主要涉及社会心理层面的文化信息和信息行为而言,则应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渗入”工作,将社会主流价值贯穿于信息网络的各虚拟文化形态和虚拟社区之中,要坚持进行科学的心理行为引导,提倡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行为方式;要把各种虚拟社区作为收集社情民意,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的重要途径,并使其发挥排解不满情绪的重要的“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同时,对于在信息网络散布反动谣言、封建迷信信息、“黄、毒、赌”信息的行为和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予以坚决的打击,以保障清洁的网络环境,促进多样化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五,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吸收优秀的外国文化成果,抵御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从长远看,中国要在信息时代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应当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入,重点扶持信息产业,坚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促进农业和工业现代化。要加强汉语发言权,扩大中文生存空间,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采取措施持续地扩大中文信息在互联网上的覆盖面,扩大汉语语言文字在信息网络上的声音。同时鼓励中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广泛地开发和利用中文信息资源,促进信息资源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扩大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影响。要注重培养信息人才,为从事信息工作的人才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防止人才外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为国家的信息化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目的在于使中国在向

信息网络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使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但这是以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为前提的。对于西方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应给予肯定,同时要学习、借鉴和吸收,这样才能使本民族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在网络时代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全球范围内文化发展态势中“西强我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着“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交流逆差”的严峻挑战。因此,在信息网络化背景下,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西方国家“文化侵略”现象,做好抵御、反击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思想文化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准备,在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主动出击,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和网上先进文化建设,利用网络培育,弘扬民族精神,抢占信息文化的制高点。

参考文献:

- [1] 乔治·瑞泽尔. 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 杨淑娇,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 宋林飞. 西方社会学理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3] 乔纳森·H·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吴曲辉,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 [4] L·科塞. 社会冲突的功能[M]. 孙立平,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1.
-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 [6]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8.
- [7]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4.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tegration of China's Mainstream Cultur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Sociology Angle

DAI Jin-ping^{a,b}, HAO Ye^a

(a. College of Law, b. Journal offic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issue for both function theory and conflict theory in western sociology.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culture is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 for the continuous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The openness of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network leads to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ultures for the forms of information culture, which greatly meets people's demands for various cultures and promotes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increases the difficulti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 H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dvanced culture in China must deal with the relation of "one and more" effectively, and emphasize on the ascendancy of our mainstream culture in 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e.

Key words: information age; integration of social culture; mainstream culture; diversified culture

(责任编辑 胡志平)